

史学新论

容闳和沈葆楨留学教育思想的比较

朱孔京

【提要】在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过程中,容闳和沈葆楨两人的留学教育思想推动了当时的官派留美、留欧教育活动。由于出身、经历以及接受教育的不同,两人留学教育思想亦有诸多差异。比较两人留学教育思想的异同,分析造成异同的原因,有助于我们从一定侧面了解当时的洋务运动,也能够比较深刻地理解当时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有助于我们从留学教育的层面上理解当时的“西学东渐”、“中体西用”等社会思潮。两人留学教育思想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近代早期官派留美、留欧活动的进展、成效及命运。

【关键词】洋务运动 留学教育思想 容闳 沈葆楨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3)05-0116-06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中西方之间的差距,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呼吁开始,发展到“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教育特别是留学教育逐渐成为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它也从一定的侧面反映着洋务运动从器物层面到文化、制度层面的飞跃。容闳是中国近代早期官派留学教育的倡导和推动者:“无容闳,虽不能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故欲述留学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①继容闳后,沈葆楨也倡导推动了船政学堂学生留欧活动。但由于出身、经历以及接受教育的不同,导致两人留学教育思想有诸多差异。比较两人留学教育思想的异同,分析造成异同的原因,有助于我们从一定的侧面了解当时的洋务运动,也能够使我们比较深刻地理解当时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有助于我们从留学教育的层面上理解当时的“西学东渐”、“中体西用”等社会思潮。两人留学教育思想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近代早期官派留美、留欧活动的进展、成效及命运。

一、容闳和沈葆楨留学教育思想的相同点

容闳和沈葆楨留学教育思想以及实践活动都和当

时的洋务运动以及早期近代化密切结合在一起,留学教育思想的观念和动机就是向西方学习,派遣学生到西方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与技术,回国后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也就是说,在倡洋务、学西方、教育救国这些方面,容闳与沈葆楨是相同的。两人留学教育思想的提出及其后来的实践活动,也体现出当时他们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怀,正如容闳在其《西学东渐记》中所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因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情,殆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快快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②“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俾遂予求学之志,……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

① 舒新城:《中国近代留学生》,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第1~2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①

从容闳和沈葆楨留学教育思想的实践过程看，两人分别倡导的留学教育并不一帆风顺，期间经历多次曲折，甚至几度搁置。在当时的中国，要想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仅靠自己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他们最终依靠的都是当时权臣的拥护、支持和推动，即都依靠了政府的力量。1854年，容闳回国后，多方奔走，一直寻找机会以达成其教育救国的理念。既求助于美国驻华公使，又结交中国权贵，1860年还曾希望依靠太平军的力量来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先后向洪仁玕、丁日昌、曾国藩等提出其教育救国的建议和具体措施。1863年，容闳被曾国藩邀到安庆帮办洋务，并结识了江南制造总局督办丁日昌，1868年，容闳通过丁日昌向朝廷上了一个“条陈四则”，“条陈之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②即“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③1870年，容闳趁曾国藩、丁日昌等四名钦差大臣奉旨赴天津办理“天津教案”的时机，催促丁日昌向曾国藩重提留学计划，终获曾国藩同意。当得知其留学教育计划即将成行时，容闳“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④

与容闳相比，沈葆楨由于本身就是当时的福建船政大臣，又由于有留美的先例，所以留学教育思想的实践在政府层面上相对容易些，但期间也是经历了一番曲折。1872年容闳的幼童留美计划实施后，沈葆楨就有派遣船政学堂学生出洋留学的设想。当时，福建船政局与延聘的洋教习所定合同的期限只剩一年，沈葆楨主张在洋员合同期满后，选派学生出洋留学，“以中国已成之技求外国益精之学，较诸平地为山者又事半功倍矣”。^⑤一年之后，洋员期满返国，沈葆楨正式奏请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可未及付诸实行，由于一无巨款，二又发生了1874年的日军侵台事件，派遣留学生出洋之事耽搁下来。台湾事件结束后，沈葆楨调离船政局，先后接任的丁日昌、吴赞诚也极力推动派遣学生出洋学习，并且和李鸿章、沈葆楨多次函商，留欧才最终成行。

另外，容闳的留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对沈葆楨的留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也有一定的影响。容闳的留学教育思想以及幼童留美活动开了中国近代官派留学的先河，在首批幼童赴美成行后，沈葆楨就提到：“御侮有道，循已成之法而益精之耳。洋人来中国教习未必非上上之技，去年曾国藩募幼童赴英国学艺之举，闽中欲踵而行之。”^⑥总理衙门对他的想法也极为赞同：“至该大臣所称分遣学生赴英法两国学习一节，查同治十年七月间，原任两江督臣曾国藩等奏遴选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

国肄习技艺，业经奉旨准行，由该督等派员在沪设局，分批遣令出洋在案。此次沈葆楨等拟遣前学堂学生分赴英法两国，探求造船、驶船之精奥，与原任督臣曾国藩等遴选学生赴美国学习技艺意思相同，一切章程，应否仿照沪局办理，抑或有变通之处，应请一并飭下”。^⑦

二、容闳和沈葆楨留学教育思想的不同

（一）“西学东渐”与“中体西用”

虽然是同时代的开明的知识分子，又先后分别推动和倡导了官派留美、留欧活动，但容闳和沈葆楨留学教育思想的本质是不同的。最主要的，容闳的留学教育思想更多的是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使“西学东渐”，沈葆楨的留学教育思想更关注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强调“中体西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容闳和沈葆楨的留学教育思想反映了中国当时及其以后的两种社会思潮。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容闳的名字与“西学东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自传的中译本也被称为《西学东渐记》。容闳的留学教育思想也始终紧紧和“西学东渐”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贫穷落后，主要在于中国当时的文明、文化落后于西方，因此只有引进“西学”，借西方文明之学术灌输中国，才是中国自强自救的根本出路。他留学教育思想的主旨就是“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⑧因此，在容闳心目中，近代化就是西化，如果再具体一点，就是美国化。而要西化，美国化，首要的一点就是改革中国的教育，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而要达到这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派遣学生到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87页。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

⑤ “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沈葆楨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7页。

⑥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第189页。

⑦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奕訢等奏”，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04～905页。

⑧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美国留学，他一生两个主要心愿的第一个就是：“一为予之教育计划，原遣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①这样，到美国留学的人越多，回国后就会大力传播美国的先进文化，中国文明程度就会越来越高，中国逐渐就会像美国一样繁荣富强。这种“以西化中”、“援西入中”的文化政治主张成为容闳的终身奋斗目标。

与容闳的“西学东渐”不同，沈葆桢则更多强调“中体西用”。举办洋务，特别是担任船政大臣以来，沈葆桢也逐步认识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差距，特别是造船和驾驶技术的差距，因此，沈葆桢一直关注的就是中国必须尽快培养出自己先进的技术人才，特别是驾驶和制造船舰的专门海防人才，在福建船政局的设立上，沈葆桢就认为“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②随着福建船政学堂学生学习的深入，沈葆桢逐渐认识到“欲日起而有功，在循序而渐进，将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提出了派遣船政学堂学生出国留学深造的设想：“前学堂习法国语言文字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乃其推陈出新之理。后学堂习英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赴英国深究其驾驶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这样，“速则三年，迟则五年，必事半功倍”。“斯人才源源而来，朝廷不乏于用”。^③

但沈葆桢在看到西方人造船、驾驶等先进技术的同时，并不赞同西方人的文化和道德观念，他一方面极力推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极力推动学生留学，另一方面又时刻不忘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并且认为这始终是根本。同时，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不矛盾，应把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教育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他认为：“盖欲习技艺不能不籍聪明之士，而天下往往愚鲁者尚循规矩，聪明之士非范以中正必易入奇邪。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且浮浇险薄之子，必无持久之功，他日于天文、算法等事，安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谨始慎微之方，所以不能不讲也”。^④这实际上就是当时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这一思想也贯穿于沈葆桢创办船厂、船政学堂及派员留学的整个洋务运动过程中。

（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和沈葆桢的留学教育思想相比，容闳的留学教育思想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在当时，容闳完全强调了教育特别是留学教育的力量，认为教育特别是留学教育就可救国，就可使当时的中国强盛起来，他确信：“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⑤如果

他的留学教育计划成为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⑥但在当时中国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正加紧侵略中国，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另一方面，封建专制、儒家思想还牢牢控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腐朽落后的清王朝更不希望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化，再加上当时中国国内文明开化的程度远没有达到容闳所希望的那样。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的实施就非常困难，更不用说单靠兴办新式的留学教育就能达到民主自由和国家富强。因此，容闳的留学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空想性。

其二，容闳在向中国输入“西学”的过程中，有“全盘西化”的倾向，他认为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状，只要把西方的东西移植过来就可以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中国二千年历史和文化，因循守旧，没有多少新鲜有趣味的东西，正因为这样，容闳可以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回国后就全力进行他的“西学东渐”事业。但另一方面，由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了解，更不可能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不可能正确地处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他的留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中，处处存在着中学与西学的矛盾，存在中西文化的冲突。这也导致容闳在中国国内始终找不到归宿，他一次次努力的效果也相当有限，最终也无力完成他的“西学东渐”计划。

和容闳不同，沈葆桢的留学教育思想要务实得多，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沈葆桢的留学教育思想是建立在其深厚的中学根底之上的。

其二，沈葆桢的留学教育思想是建立在举办洋务、培养驾驶造船专门人才的具体动机之上的。两次鸦片战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② “同治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沈葆桢折”，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

③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沈葆桢折”，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03～904页。

④ “同治六年八月初八日沈葆桢折”，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46页。

⑤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⑥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页。

争，西方列强都是从海上攻入，沈葆楨等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海防空虚、海疆不保的危害性，进而认识到建设海军、加强海防的重要性。加强海防建设，一是造船、造舰，二是培养掌握造船和驾驶技术的专门人才。开始，洋务派一方面重金雇用洋人，充当技术顾问，开办了一些制造厂、船厂，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直接向西方购买船舰的便捷之策，但是用外国人指导造船、驾船，中国人“虽日习其器，究不明乎用器和制器之所以然”，“倘洋匠西归，中国匠徒仍复茫然，就令如数成船，究于中国何益？”^①种种因素使沈葆楨等洋务派官员认识到强化海防的根本良策，是要尽快培养出一批中国自身的驾驶和制造船舰的专门海防人才。

其三，沈葆楨的留学教育思想是建立在船政学堂学生国内深厚的学习基础和实践之上的。福建船政学堂是随着福建船政局的建立而设立的，“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规定“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义子弟，入局肄业”，“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从而达到“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的目的。^②经过多年的船政学堂的学习、训练，留欧学生在国内就已经打下了坚实的中英文和制造、驾驶等专业知识的基础。正如沈葆楨所言：“闽局如前学堂及绘事院之艺童，数年来已学有根柢，且兼谙手艺，即各厂之艺徒，已习手艺亦兼读过洋书。此次议赴泰西，固应变通沪局章程，而求其精善。”^③

其四，由于沈葆楨本身就是船政大臣，可以全力推行他的留学教育思想，不需要像容闳那样需要处处求助别人，依附权贵。留学教育思想实践起来也就相对容易得多。

（三）注重人格、修养的养成教育与注重实习和训练的实践教学

与自己的留学经历相联系，容闳的留学教育思想更加注重于学生的人格、修养等方面的养成教育。后来他倡导的幼童留美，在很多方面也是受其留学教育思想的影响。留美幼童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都是寄宿在美国家庭中，在美国的学校里和美国学生一起读书、一起进行体育娱乐等各种活动，学习、生活较自由。对此，容闳深为高兴“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冶，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不足为学生责也。况彼等既离去故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而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踉驰骋，不复安行矩

步，此皆必然之势”。^④也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中，幼童不知不觉地吸收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与容闳相比，沈葆楨更加注重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他主政“船政学堂”期间，就高度重视学生的实习和训练，如造船学堂的学生每日要抽出半天的时间由外国教师带领进厂实习，绘图学堂的学生每天要用几个小时对船用蒸汽机进行观察和测绘，驾驶学堂的学生毕业以后，都要进行船上实习和远航训练等。留学时，由于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所以对实践方面的要求更高。早在留欧之前，沈葆楨就指出“今拟法学办法，半日肄业工厂，每年复以两个月游历各国各船厂铁厂，以增长其见识”，“至英国驾驶之学，每年均在学堂，亦以二个月赴大兵船上阅看练习”。^⑤1876年刘步蟾、林泰曾二人在英国高士堡学堂学习时，沈葆楨致函总理衙门建议：“缘该生等系水师人员，宜在船练习航海穿洋，方臻阅历，若久与船离，恐致旷荒，倘以为不必即归，则请咨询总理衙门照会英国驻京公使，准其入英国大战船一二年，续学驾驶”。^⑥在所订留学章程里，更重视将书本知识与实际历练结合起来。留学生在英法海军学校和工程学院学习理论知识后，必须入工厂或兵船实习，学习制造的留学生在第二、三学年内，“约以每年游历六十日为率”；学习驾驶的留学生从学校毕业后，上外国兵船实习两年，“其间并可常赴各厂及炮台、兵船、矿厂游历，月共一年，再上大兵船及大铁甲船学习水师各法，约二年定可有成”。甚至规定“既上兵船，需照英国水师规制，除留辮发外，可暂改英兵官装束”。^⑦正是通过这种针对性、短时性的、急功近利式的学习，再

① “同治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沈葆楨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8页。

②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折”，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时期的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286页。

③ “同治十三年二月十九日沈葆楨上总理衙门言出洋书”，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时期的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07页。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103页。

⑤ “同治十三年二月十九日沈葆楨上总理衙门言出洋书”，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时期的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07页。

⑥ “光绪二年二月十日沈葆楨致总理衙门文”，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时期的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11页。

⑦ “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鸿章、沈葆楨等折”，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时期的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19页。

加之原来已有的深厚基础,他们进步很快,成绩也非常优异,这比原先局限于船政学堂的实习,眼界也大为开阔,

在爱国、经世、自强、选派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这些方面,容闳和沈葆楨显然是一致的,容闳更多强调的是西学东渐,在容闳看来,引进西学,发展教育,培养有用人才,才是中国自强自救的根本出路。沈葆楨更主要是强调中体西用。容闳更主要的是一个西化人,要使他的留学计划能成行,就要适应当时传统的中国,沈葆楨更主要是一个传统人,其留学计划的成行,就要适应世界。和容闳相比,沈葆楨的思想务实得多,也更能和当时洋务运动的目标相一致,因而在实行的过程中也就容易得多。

三、容闳和沈葆楨留学教育思想差异的原因

容闳和沈葆楨由于出身、经历的不同,特别是两人受教育的不同,造成两人思想、观念、人格的不同,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西方先进文明的认识不同,从而导致他们学习西方、留学教育思想的不同。

1828年,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南屏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少年时容闳就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并入读郭士立夫人(Mrs. Gutzlaff)创办的学校,1839年该校停办,容闳也返回家乡,1840年其父辞世,由于家贫无以为生,容闳找了一个折叠小工的工作。1839年美国人白朗(Rev. S. R. Brown)抵达澳门后,马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正式开学,1841年容闳入马礼逊学校,同学共六人。1842年,由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到香港继续学业。1846年12月,白朗返回美国,离开时带同容闳、黄宽及黄胜三人前往美国留学。容闳赴美后于麻省之孟松学堂(Monson Academy)就读,后来由于白朗的帮助,他得到乔治亚州萨凡拉市妇女会无条件的资助进入耶鲁大学读书,1854年毕业后回国。从容闳的经历看,他从小接触的是西方文化,接受的是西式教育,涉猎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美国式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化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使其成为一个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容闳又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当他看到当时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腐败、人民苦难的现状时,内心十分痛苦。在他进入耶鲁大学之前经济支持出现问题的时候,孟松学堂曾愿意资助他,但以毕业后必须回中国作牧师作为条件,容闳断然回绝,他希望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祖国谋福利,使祖国强大起来,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选择了教育,认

120

为兴办近代教育,把西学传播到中国,就能促进中国的繁荣富强。而促使大批青年到国外留学,像自己那样接受新式的西方教育,显然是最好的教育方法。留学将容闳的爱国主义与“西学东渐”的目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是,由于容闳自幼就在教会学校读书,后又长期在美留学,自少年时代起就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对他没有多大影响。由于初年的文化养成以及异域的成长背景,所以他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将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其影响也必然有限。

与容闳不同,沈葆楨走的是一条规规矩矩的封建正统之路。他1839年中举人,1847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来,先后补授江南道监察御史、江西九江府知府、江西广饶九南道道台等职。由于性格耿直得罪上司,于是去职回家养亲。1860年,重又被起用,授吉甯南道道台,沈以父母年老而婉辞,于是被留在原籍办团练,得到曾国藩的赏识。1861年,曾国藩请他赴安庆大营,加以重用。不久,推荐他出任江西巡抚,1867年左宗棠被调往陕甘任陕甘总督。临行前左宗棠上疏保荐沈葆楨接替他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此时,正值洋务运动举办军事和民用工业的兴起之时,时代也给了沈葆楨展露才华的机会。沈葆楨最早由母亲林惠芳(林则徐之妹)传授儒学义理,后通过科举取得功名为官,一生深受儒家传统的忠孝礼义等的影响,是典型封建正统教育下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沈葆楨一生,也深得清廷宠信,曾被委以各种重任,为此,他对清廷感恩图报,处处表现出忠于国君、忠于清廷、忠于职守。因此,他在招收学生时要求应考学生具有较高的传统文化知识,在教学中,更是用传统士子的模式规范学生,惟恐他们在学习西方海军技术的同时思想也随之西化。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批开明的封建知识分子林则徐、魏源等从爱国御侮的角度出发,以开明的思想审视西方,开眼看世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强化海防建设,抵抗外国的侵略。这些经世致用的爱国主张对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沈葆楨产生重大影响。沈葆楨自小就受到父亲沈廷枫、舅舅(也是岳父)林则徐、老师林昌彝等人经世致用和爱国思想的影响;同时他又深受洋务思想的影响,所以在他身上,爱国、传统、经世、改革、自强等观点集于一身。^①

① 参见[美]庞百腾著《沈葆楨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陈俱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9页。

四、容闳、沈葆楨留学教育思想对留学教育实践的影响

容闳和沈葆楨两人的留学教育思想对当时的幼童留美和船政学堂学生留欧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早期留美幼童的派遣上，容闳的推动作用显然是巨大的，后来的幼童留美的整个过程，也深深打上了其“西学东渐”的痕迹。在幼童留美过程中，由于受容闳留学教育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年龄小，接受新事物快，和美国人联系密切，采取的是“家庭式”的、寓教于乐的留学教育方式，因此，他们大都接受了正规而系统的美式文化教育，学习了一些崭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这种留学教育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开放的、中美文化融合的趋势。但幼童这种越来越西化的倾向，显然是清政府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从一开始，对他们的传统教育和传统限制就非常严格，这必然造成出洋肄业局里各种各样的矛盾。同时这种“西学东渐”式的教育，在中国国内当时的洋务派看来，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不能立即和他们“富国强兵”的目的相一致，这些都成为幼童中途撤回的主要原因。一些留美幼童回国后，因所学专业在国内尚无用处，被送入新式学校，改学国内急需的其他专业，如首批留美幼童詹天佑等16人，回国后才考进福建船政学堂的驾驶学堂，学习驾驶。

但是另一方面，留美幼童这种扎实的“西式”基础教育具有长效性，当时在美国已经进入大学学习或者归国以后又去美国大学学习的留美生在选择大学里的专业时，许多人就选择了国家最急需的机械、铁路、矿冶、邮电、造船、法律（特别是国际法）等专业，由于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们进步很快，成就也较大。

留欧生由于受沈葆楨实用、功利等留学教育思想的影响，再加上留学时年龄较大，学习目标明确，时间紧，任务繁重，为了使自己的专长“精益求精”，回国后为国家的海军造船、制造等事业直接服务，可以说他们的整个留学教育活动和国内船政学堂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采取的也是专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留学教育方式，吸收更多的是英法等先进国家的炮船技术，这种短期的、急功近利式的留学教育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达到了洋务派“富国强兵”的留学目标。留欧生大都完成学业，学有所成，回国后，受到了各种奖励和待遇。特别是在海军方面，许多成为各造船厂的管理人员、技术骨干以及各个舰船的主要领导人员，为近代海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讲师

责任编辑：赵俊

The Comparison of Overseas Education Thoughts between

Rong Hong and Shen Baozhen

Zhu Kongjing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he overseas education thoughts of Ronghong and Shen Baozhen had advocated and promoted the education activities of dispatching students by government to Europe or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in early modern China.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backgrounds of family,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Ronghong and Shen Baozhen had many different overseas education thoughts. Comparing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ir overseas education thoughts and analyzing the reasons for the phenomenon can help us, from a certain side, to learn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t that time, which makes us more profoundly understand the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t that time, and helps us understand social ethos such as “Western Learning”, “Chinese-style Westernization” from the angle of overseas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a. The differences of overseas education thoughts between Ronghong and Shen Baozhen had made a certain influences on the process, effect and destiny of the government-dispatched students to Europe or the United States in early modern China.

Key words: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Overseas Education Thought; Rong Hong; Shen Baozhen